

民族主義研究者與蝙蝠

蕭阿勤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清華大學社會所兼任助理教授

傍晚時分，我抱著剛滿兩歲的兒子坐在膝前，一起在鄉下老家門前的長廊乘涼。漫天的晚霞，夾雜著映成橙紅的雲朵。微微晚風中，偶而傳來幾聲秋蟬淒清的鳴叫。門前的路燈已經亮起，照出幾隻蝙蝠在低空飛舞。兒子正咿呀學語，而且好問，飛動的蝙蝠馬上吸引他的注意。「把拔，嘿，嘿，嘿……洗啥覓？」（「爸爸，那那那……是什麼？」）我本來要回答：「哦，嘿洗亞跛。」（「哦，那是夜婆（蝙蝠）。」）但是轉而一想，那飛來飛去的樣子，多麼像鳥，兒子還小，反正分不清楚，乾脆就說是鳥好了，於是答道：「哦，嘿洗叫阿。」（「哦，那是鳥兒。」）這樣一想一答，突然覺得自己研究民族主義，和蝙蝠好像有點關係。低頭看看兒子，對這個答案他已經滿意了。民族主義研究者和蝙蝠有何關連？且藉著我談談個人研究（台灣）民族主義的感想，慢慢道來。

東西方冷戰結束後的二十世紀末，民族主義政治令人意外地再度成為世人關切的焦點。不僅在東歐前共產國家與前蘇聯，並且在西歐與北美，民族主義激起的集體行動與新仇舊恨之激烈，都令人震撼不已。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台灣社會有民族主義問題，並非極其獨特的事。至遲在十八世紀末，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統治形式已逐漸成形於西歐。兩百年來，它們即使不被認為是指導與組織人類社會的最佳方針與形式，至少在事實上已成最佔優勢的政治社群組織理念與架構。東歐與前蘇聯的政治變化之所以令人驚訝，並不在於民族主義政治的新奇，而在於歷經七十幾年蘇維埃聯邦架構的統治，各加盟共和國各自的政治社群認同的持續，以及族群做為民族主義政治動力的暴烈與血腥。

台灣受過殖民統治，那麼從被殖民地地區的歷史來看，台灣有民族主義的問題，更不是什麼極其獨特的事。世界上被殖民地地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進行的民族主義運動與國家形成的過程，是眾所皆知的事。台灣的族群政治（特別是以本、外省人分類為基礎而發展的政治過程）與民族主義問題，反映的是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內戰獨特歷史的長遠影響。我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亦即文化菁英在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中不同於政治菁英的角色，以及他們在文學、語言、和歷史方面建構「台灣民族」認同的發展經過。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發展也許不是什麼獨特新奇的事，不過研究民族主義問題，卻可能是一種很特別的經驗。就我自己研究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感受

來說，這種特別的經驗主要是因為研究者研究的是自己所屬的那個社會的民族主義問題。民族主義問題，追根究柢是以「民族」這個集體認同來進行政治社群（國家）的劃分與定位。既然牽涉到集體認同，自然要嚴格劃分「我們」、「他們」。這種劃分，也就是現實政治中的「立場」問題。台灣社會有民族主義問題，本地學者對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通常不能免於被「解讀」政治立場的可能。換句話說，在自己所屬的社會，一個「民族主義研究者」時常有被歸類為某種「民族主義者」的可能。

這種經驗的特別，拿來和史學家 Eric Hobsbawm 的話互相參照，就更加清楚。在他 1990 年出版的經典之作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中，Hobsbawm 說了一段對民族主義研究者的忠告。他說：沒有那個嚴肅的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史學家，可以同時是一位政治上熱情投入的民族主義者——因為民族主義需要太多的信仰，信仰那些顯然不是那個樣子的東西——除非史學家在進入圖書館或書房時，把自己的信仰拋在腦後。我想如果借用這段話來忠告研究自己所屬社會的民族主義的社會學家，Hobsbawm 大概也不會太反對。想想看：一位在自己社會的民族主義政治上立場鮮明、熱情投入的社會學者，如果從事這個民族主義的研究，那麼他的研究多麼啓人疑竇！比較來說，譬如研究自己所屬社會的性別、勞工、或教育問題的社會學家，同時又是女性主義者、勞工運動者、或教育改革推動者，他們同時結合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似乎並沒有使他們的研究易遭懷疑。換句話說，在台灣研究台灣民族主義或相對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一個最特殊的經驗就是這樣的研究時常被用來推斷研究者的政治立場，解讀其社會實踐的意涵，因而讓人懷疑其研究動機。如果研究者自覺地避免扮演某種民族主義者的角色（而有些研究者卻樂意扮演），那麼這種解讀習慣自然對研究者形成一種壓力，迫使研究者反省：自己的民族主義研究，和提倡某種民族主義的宣傳，有何不同？做為民族主義的研究者，和民族主義者有何不同？而這些不同，對自己的民族主義研究，有何意義？這樣的研究，對這個存在有民族主義問題的社會，又有何意義？

大家都聽說這個故事：蝙蝠跟鳥說牠是鳥，跟老鼠說牠是老鼠，因為牠像會飛的老鼠。研究自己所屬社會的民族主義問題，我似乎愈來愈清楚蝙蝠的心理。一隻不斷自省的蝙蝠應該不是學會故事中的跟鳥說鳥、跟鼠說鼠，而是在有人說牠像鳥，也有人說牠像鼠，或者有人說牠不像鳥，也有人可能說牠不像鼠的時候，淡然處之。我相信在自己所屬的、存在有民族主義問題的社會，研究其中的民族主義問題所面對的這種特殊經驗，其實是激勵研究與不斷反省的動力，而不是變成阻挫研究者的因素。至少蝙蝠可以不做鳥也不做鼠，對自己的認同愈來愈清晰，愈來愈堅持。下次兒子再問起那暮色中狂動飛舞的一群，我會告訴他：「哦，嘿洗亞跛。」